

生人與評批，執文

著 傑 許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地 戰

生人與評批 藝文

許傑 許

行發社版出書圖地戰

自序

這本集子裏面收集的二十多篇文章，除了周作人論是十一年以前，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問題，中國文法革新泛論，及論語言意識三篇，是五年前寫的以外，其餘各篇，差不多都是這一二年以內寫成的。我感謝許多關心我，鼓勵我的朋友們的好意；要是沒有他們的鼓勵與催促，我今日是否能寫出這一些文章，而且給他匯印成這樣一個集子，恐怕還成問題。記得自己開始從事文藝寫作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東西，印在紙頭上面，便是一種滿足；而到了可以給他集成一個集子，而且又給他印成了集子時，則更加是一種滿足。可是，到了後來，看看這所謂印成的集子者，竟然也有七八個之多，而自己却並不感到怎樣的興趣。抗戰以前，因為振鐸兄有第二次編印文學研究會叢書的計劃，而且也出版了幾本叢書的時候，我也曾經將自己過去的作品，選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子，約計二十萬字，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不意合同剛剛訂好，蘆溝橋事變即行爆發，從此以後，我便轉入內地，而這部稿子，却就想也沒有想到過他。這中間，我對於自己的看法，似乎又和從前不同。自己寫的所謂文藝作品的東西，雖然也是自己心血의 結晶，而且也不敢忍心把他降到了「無用」的等列，但反躬想想，一定說要把他印在紙上，却也無

甚道理。文字離不了人生，文學也就是人生的表現。如能挺起腰骨做人，真是對國家社會，有了什麼貢獻，那他的一生，就該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不然的話，在行爲上陰謀險詐，在思想上鄙卑無恥，不管怎樣模仿別人，印他幾部冊以前文錄，四十以前文錄，畢竟也有些近於下流，而且仍然還是「東施」。至於靠着一篇文章寫成，就想向資本家送秋波，丟眼色，預備從此可以引進；或是一本書抄好，再在自己的序文上把名人拉在一道，說某人已是名人，尙且未能完成此種工作，又說自己如今寫成此書，正所以代替某某名人，完成此種工作，這樣一吹一捧，又吹又捧，也就顯示了他那流氓加上妓女的招供，於作品本身，又有什麼補益？我因爲看多了這種伎倆，并且討厭這種伎倆，有時甚至對自己的東西，都覺有些躊躇起來。我又何必印什麼集子，除了所謂災梨禍棗，還要把自己的寫作難廁在這些東西之間作甚？可是，近年以來，我也跟着年齡，在現實社會上，學會了看人和看文章的方法，聞其言而信其行，和聞其言而觀其行，的確是不同的境界。同時，我也時常從文學中看人生，從文學中看人生批評；我在這樣看法，我知道文學中的人生，也就是現實的人生；而從人生看文學，以文學批評的基調來做人生批評的出發，則更能顯出現實的人生，原來就是一部無字的巨著。我用文學批評、批評現實的人生，我也用人生批評、批評當前的文學。我覺得，這裏面有非常緊密的連繫，却不是一句八股的套題。我曾經在現實的人生當中，讀到了無字的新儒林外史，和現代版的新西遊記。我看見一個個馬二先生嚴貢生之成名，

也看見了許多蜘蛛精靈蟬精的得道與飛昇。我有時批評，有時指引。明知這批傢伙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但在我方面，總算盡其在我，雖說無濟於事，總想使人警惕。至在社會，或可使知尚有是非存在，或可一正視聽。忍也不爲過份。無如抗戰多年，建國多年，人慾越是橫流，人性越是卑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因自己尚有此一點精靈不昧，幾乎一脚跌入盤絲洞裏。幸虧自己兩腳尚稱穩健，還可一步一步的走我的人生道途。過後想想，我的鏢槍，雖說沒有投得成功，但也沒有投錯了目標。如果我是鄉愿，我常用「何必」一詞，來笑自己多事。大家都爲吃飯，用一個石灰刷子，兩面光生，豈不是好；何必自討苦吃，自尋沒趣？但我反以此自得，知道通匪、藏匪、與匪同罪的意義，必不得已而須要投擲鏢槍之時，明知狗急也能跳牆，却總不能封起嘴來不說。所以，細細估計，我的立根於文學批評的人生批評，雖說沒有成功，但也不敢自認失敗。同樣理由，我之對於文學，也不敢使他遠離人生，我用人生批評的態度，來閱讀文學，批評文學。而在有時，批評了文學，也就在批評了人生。我也明知，在文學批評上面，作興也可運際到人生批評所遭際到的遭際，但我仍舊只能以對人生的態度對他。如果在我的文學批評上同樣的發見了人生的反撥，我自然只能以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態度來自處。有人說，今日的新文化或具新文學運動，已經不應該是五四時代的思想與口號，而却應該是生活的實踐，與生活的態度。我可頗平心折這一個見地，倒大有雖不能至，然却心向往之之概。我的文章，就是我的人生的紀錄，也是我的

人生表白。我既然還生活在這人類社會裏，也並不想出世，也不想入山，我又爲什麼不把自己的文章印成集子，讓他自己到社會上碰碰運氣呢？自然，這也如同我的做人，我的文章，也當有很大的缺點；如果隱忌了自己文章的缺點，這就正如隱忌了自己做人的缺點；如果如此，這就應該批判。而且應受批判。我自己知道，我的見地恐也不見得正確，我的寫作，自也不見得成熟，我不敢妄自大言，說自己的文章，該有什麼些微的價值。但我的態度，我的主張，自己却未敢加以否定。我覺得，文學與人生是統一的，而且是合一的。我覺得，無論對於人生或是對於文學，真理真是非的執着，以及對這執着的真理真是非的嚴肅的宗教信仰的人生態度，却是不能輕易改變的。我的見解 我的主張，容有拘囿於我自己的學力之處。我自己知道，我拘囿於我自己的學力之處，當然很多，但我當在我的做人與爲學上面，儘量的望能廓清。我想，我從善如流，我也擇善固執。而且，我也想我更應當從善如流，應當擇善固執。如果我不把自己的文章，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印成集子，我又將何以討得別人的了解，別人的認識，更將何以討得明確的批評與指正，使自己有機會可以擇善而從，使別人知道我的固執之所在呢？十一年以前，我從周作人的文章當中，讀出了周作人之爲人，我又從做人方面入手，批評了周作人的爲人和他的文章。那時，正是周作人躲在苦雨齋中被捧得發紅的時候。但是，一直到了如今，周作人却用他自己的行動，證明我在十餘年前所批判的命格。前些時候，有一位青年朋友，在舊雜誌上讀到我那篇文章，

自己寫信來說，竟然驚奇於我能算命。拆穿了說，我還不是用看人的眼光看文章，用看文章的眼光看人而已！我沒有什麼祕訣，我同我所批判的人物和他的文章，也並沒有什麼不世之仇，而有些從文章上見面的人物，簡直連面長面短也不得而知，既無一面之緣，自然更無所謂私人恩怨。至於我的批判的人物，雖然也因某種機緣，大家才相互認識，但這也是一種因緣。在人生的旅途上，總可說是難求的會合；何況生命有限，友情可貴，却又何必斤斤於什麼短長？無如我在人生的文學中，讀到了現實的無字的著作，我從他的言談，從他的行動，以及由這言談與行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我又怎敢不用讀作品的態度來讀他，批評作品的態度來批評他呢？有時，我也在這人生的文學當中，讀到了很好的，了不起的創作，自然，我也應得如同推崇偉大成功的作品一樣的推崇他，但當我讀到一篇傾向並不很好的無字文章，我就同樣的不能銷默。我開始也頗想獻些愚忱，希望我們的作者有所改正，至於傾向原不很好，而且從此一瀉過去，恐將有不良影響，這又怎能不予以無情的批判呢？所以，我是時常把人與文章是連起看的，我的人生批評，文學批評，都是同樣的出發於人生。我所能夠做而且也會經在這裏做的，只是如此而已！這一本集子裏的文章，有些是批評作品的，但有些却也因爲批評作品而涉到了持這見解寫這作品的人；有些是並不批評什麼的，只是說我自己所見到，而且心中所要說出來的說話，但這也就表示了我的見解，站在我自己的人生立場上，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表現了我自己的人生。我對自己不敢

隱秘，我對社會人生，更不敢隱秘。在有一個可能的機會的時候，我為什麼不把牠印成一個集子呢？我非常感謝許多關心我鼓勵的朋友，我更感謝能够給予這本書出版的機會的文化機關。我的這本小書，就讓他這樣去問世吧，另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在十年以前寫的文藝論文，應該還有幾篇，但現在可找他不到了；這一篇周作人論，是由一位熱心的同學轉抄給我的，我就給他附在這集子的後面。

一九四五，三，十六日寫好。



自序

文藝自由新論.....	一——三
論文藝批評的積極性與建設性.....	一四——三〇
論文藝上的「真」.....	三一——四二
創作與批評.....	四三——五二
文藝・批評與人生.....	五三——六一
論魯迅的歷史小說.....	六二——七五
論文學運動上自由的要求.....	七六——八二
文藝教育論.....	八三——八六
民族形式與民族文學.....	八七——九五
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問題.....	九六——一〇六
中國文法革新泛論.....	一〇七——一一八
論語文現象與社會關係.....	一一九——一二六

論語言意識·····	一二七	一四二
論文藝作品中的戀愛問題·····	一四三	一四七
論文藝上的諸問題·····	一四八	一六一
論沈從文的寫作目的·····	一六二	一六八
談浪漫主義·····	一六九	一七五
論「再來一次白語文運動」與文藝運動·····	一七六	一八一
東南文壇與東南文藝運動·····	一八二	一九五
關於東南文藝·····	一九六	一九八
關於東南文藝運動的初步計劃·····	一九九	二〇二
論現階段的語文運動·····	二〇三	二一〇
半年來的東南文藝運動·····	二一一	二三三
評文壇平議·····	二二四	二三四
「文學批評的新動向」·····	二三五	二五七
歐陽凡海的「魯迅的書」·····	二五八	二六四
關於人論·····	二六五	二九〇

文藝。批評與人生

文藝自由新論

◎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壇，因為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和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提出文藝創作的自由，要求文壇「勿侵略文藝」，於是就熱烈的展開了「文藝自由」的論辯。這一問題的討論中心，概括的說來，大概即是文藝的階級性，政治性，及文藝的藝術價值，與武器作用的問題等，而這些問題的討論，在那個時候，也大概都已經解決了的。所以，文藝創作的應否自由，如今已不能成為新的問題，似也無須再行討論了的。

雖然，文藝創作的自由的要求，正如魯迅所說：「生在戰鬥的時代裏，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這樣的人，實在是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我們自然也沒有這種要求。但是文藝與自由在別

一意義上的連繫。爲了文藝的發展與前途，爲了文藝的武器作用的正確的運用，爲了粉碎侵略者殘暴無比的陰謀，爭取世界愛好自由人民的嶄新社會的實現，文藝自由這一響徹的主題，是值得我們重新提出來討論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國會宣佈了四種自由的信條，認爲這四種自由，是聯合國家，站定崗位，反對納粹奴化世界的革命的中心目標。所以，這一次的世界大戰，也可以說是自由世界與奴隸世界的鬥爭；而我們聯合國家，特別是我們中美英蘇四大強國，對於這一次大戰，也完全可以說是爲自由世界的實現而鬥爭，爲自由而鬥爭。羅斯福所說的四種自由，除了信教自由，似乎對我們中國，不感覺到有什麼大的要求，大的興趣以外，其餘如言論自由，不受迫害的自由，不處困厄的自由，卻都正是我們所極端，而且迫切的需要的。

孫科先生根據了總理的三民主義，提出「三種自由的爭取」（原文載國訊三六九期）的口號，說是「我們中國，在目前有三種自由必須爭取的，那就是對外要爭取民族自由，對內要爭取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接着，他又說：「這三種自由，就是三民主義的目的。民族不能自由，這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

，就無法生存：政治不能自由，這個國家裏面的政治一定是專制的，落後的；經濟不能自由，人民的生存，一定得不到保障。一所以，我們爲了三民主義的實現，必須爭取這三種自由。反過來說，總理的提倡三民主義，四十年的不斷的革命，也是爲了爭取這三種自由而奮鬥的。總裁所領導的這次抗戰建國運動，八年來的艱苦奮鬥，也是爲了爭取並且實現這三種自由的。一切的抗戰行動，是爲這三種自由，一切的建國行動，也是爲了這三種自由！

所以，自由的爭取與要求，是我們最大的要求，也是我們最高的目標。這在世界第二次大戰的今日，我們的聯合國家是如此，而我們中國的對日抗戰，展開反侵略反法西斯的鬥爭，更是如此。如果將羅斯福總統所提的四種自由，與孫科先生所提的三種自由，兩相比較，我們總覺得孫先生所提的更爲明顯，更爲概括，更爲切合中國的實際的需要。因爲信教自由，非但在我們中國，不感覺得怎樣的需要，就以他的性質而論，究竟屬於民族自由，或是政治自由，也不見得很顯明。言論自由，不受迫害的自由，固可相等於政治自由，不虞困厄的自由，也可相等於經濟的自由；但民族自由一項，却是羅斯福總統所想像不到的。特別是當我們抗戰了八年的今日，我們的主要目的，也在於爭取民族的自由。「如果民族得不到自由，政治與經濟是無法自由的。」（孫科先生語）所以，民族自由一項，却比任何自由，更爲重要。

總之，在今日世界聯合國家反侵略，反納粹奴化世界的潮流中，在中國空前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呼聲中，自由的要求，自由的爭取，是世界愛好自由愛好和平正義人們的最高努力的目標；特別是我們中國，我們八年來的艱苦奮鬥，我們流了多少熱血，擲了多少頭顱，我們最後的目的，也無非要實現三民主義，實現民族、政治、經濟的三大自由。自由對於我們，是更加值得寶貴的。我們該爲民族政治與經濟三大自由的實現而奮鬥！

文藝是社會文化現象之一種，它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因爲它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所以，它在文藝創作的實踐上，是不能離開了它的政治性和階級性的。因爲它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所以，它在社會文化現象的效能上，也是不能否認它的武器作用的。同時，也因爲它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所以，它在文藝價值的評價上，也只能使它和政治價值連繫起來，統一起來，才能達到藝術評價的最高價值。在現階段的社會，我們正有一個自由的要求；我們的一切行動，都爲了這自由的爭取。這一次的世界大戰，爲的是反對納粹奴化世界的陰謀，爭取四大自由的實現；這一次我們的反日本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戰爭，也爲的是爭取三民主義，即民族、政治、經濟三大自由的實現。在這一世界爭取自由的大潮流

中，作爲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的文藝形態，與文藝任務，自然是不能放棄了它的政治作用和武器作用的。同時，也只有強調它的政治作用和武器作用，它的藝術價值，才能完成的。

不過，文藝的政治作用和武器作用，也正如全世界人民大眾對自由的要求與爭取一樣，他們都同樣的具備着雙層的意義。全世界的人民大眾，爲了要爭取自由，他們本身，就須求得了自由；因爲他在本身上取得了自由之後，他們爭取自由的力量，就能够發揮出他的最大的戰果。譬如蘇聯，因爲他的人民已經有了自由，因此，他們爲爭取自由而發揮出來的力量，也更加偉大。孫科先生說：「要使人民的力發動員起來，則必須給人民政治自由！」（見三種自由的爭取）便是這個意見。反過來說，人民大眾，所謂爭取自由，固然是爲全世界整個的自由，但同時也爲的他自己本身的自由，這譬如我們中國，我們的對日抗戰，固然是爲了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爲了世界真正的自由，但同時却也爲着我們自己的國家民族的自由。從文藝的見地來說，文藝的本身，原來就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它在某種情形之下，——直截的說，即在民族不自由，政治經濟不自由的情形之下，它的本身，是無從取得自由的。同時，也因爲文藝是一種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它要配合着社會現實生活的要求，發揮出它的爭取自由的最大的力量，又不得不從爭取它自己本身的自由入手。因此，文藝自由的任務，便包涵着兩種偉大的意義。這兩種偉大的意義是：一、爲了發揮文藝的政治作用與武器作用，它在這爭取自由的偉大潮流中，便應該以

自由的爭取，作為它自身努力的目標。以配合全世界愛好自由人們的要求的鬥爭行動。二也爲了要發揮它的政治作用和武器作用，它應該先從自己本身不自由的環境中，取得了自由，要能這樣，它才能配合着這一戰鬥行動，發揮出最大的戰鬥力量。換句話說，在文藝自由的口號下，對於文藝本身的自由，即文藝的寫作與出版，應該有自由，而文藝的一切努力與運動，也應該仕奉於自由。

四

我們中國這一次的對日抗戰，目的是在爭取我們民族的自由；而爭取民族的自由，却是爲了爭取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大眾的政治與經濟的自由。固然，在民族自由尚未爭到，侵略者的鐵蹄，尚未趕出中國以前，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政治與經濟的自由是無法取得的。但是，反過來說，在人民大眾的政治與經濟的自由，尚未得到以前，就是要動員民衆，爭取民族的自由，也是頗爲困難的。所以，這是一個相互的關係，我們在爭取民族自由的過程中，是不能忽略了政治與經濟的自由的爭取的。

文藝在抗戰演役的過程中，它是應該發揮出它的政治作用和武器作用，以仕奉於抗戰。在這中間，我們的文藝陣營，曾經發出了抗戰文藝，民族文學；或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我們的目的，無非也想在這空前的民族解放的偉大戰爭中，用文藝的力量，來儘量的推動，並且加速這一任務的完成。

。固然，民族的自由，高於一切的自由；在民族的自由沒有得到以前，什麼政治自由，經濟自由，都可無從說起。一切爲了前綫，一切爲了勝利，這話自然是不錯的。但是，在人民大眾沒有得到政治與經濟的自由之前，人民動員的力量，就不能發揮得盡致，而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的把握，在時間上就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一。其次，政治與經濟的自由，原來就與民族的自由連結在一處的；我們在這個時候，也不能說政治與經濟的自由，是一次要的問題，是可以留待戰後去解決的。孫科先生說：「如果一切紛雜的問題，都留待戰後，則紛雜的問題將愈紛雜或無從解決；所以我覺得，在爭取勝利的大前提下，一部份剩餘的腦力亦可研究其餘的問題，……除爭取抗戰勝利之外，當須研究政治與經濟的自由。」

根據了這個理由，我們覺得，我們在我們文藝陣營中，我們僅僅提出了抗戰文藝，民族文學，或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大衆文學，似乎還有些不夠的。因爲一切爲了前綫，一切爲了勝利，文藝運動之應該什奉於抗戰，固然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文藝的戰鬥武器，畢竟不同於另外的戰鬥武器，另外的戰鬥武器，是直接可以和敵人決勝於沙場；而文藝這一戰鬥武器，却只能在動員人民大眾和打擊侵略者的陰謀與野心這一點上，才能發揮他的最大的效能。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便已經感覺到，文藝的什奉於抗戰，已是不能單純的強調着民族自由或民族解放戰爭這一點了。何況民族自由本身的爭取，也不能忽略了爭